

汲取古城精华 开拓新兴之途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观瞻

胡 承 恩

“胜绝新安郡，高秋拥传行……”。①

徽州首邑歙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与浙江毗邻，自古文风昌盛，夙有“东南邹鲁”之称。是我国62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县城。

一、从山越古邑到中国名城

歙县建置于秦代，隶会稽郡，秦以前泛称为“山越”，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了。近年，在境内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省考古部门鉴定，早在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开拓着古老的文明。歙县之得名有两种说法：其一，据县志记载：因县南有水口“歙浦”而得名；另一说，歙与翕通，谓山水翕聚。“五峰拱秀，六水回澜”。是说有六条溪流聚合于瀛洲此。汉初，歙属鄣郡（今浙江长兴一带），后属扬州丹阳郡。据《三国·吴志·贺齐传》，建安十三年（208），孙权遣贺齐征山越，讨黟歙，分歙东的叶乡、武疆二乡置始新、新定二县（即后来的浙江淳安、遂安），复分歙西置休阳、黎阳二县，连同黟歙二县，置新都郡，以贺齐为太守。从此，“山越古邑”成了“江东支郡”。西晋太康元年（280），改新都郡为新安郡，新安之名由此开始。隋开皇九年（589）以新安郡并入东阳郡，遂并黟、

歙入海宁县，隶婺州。两年后，即隋开皇十一年（591）复置歙县。隋义宁中（617—618），新安郡治迁于歙城乌聊山。尔后，从唐至清1300余年间，歙城均置为州府治所。北宋末年，方腊起义，歙、睦二州乃首义之地，农民军惨遭镇压，歙州城邑几成废墟。宋宣和三年（1121）诏改歙州为徽州。从此，才有徽州这个名称。宋南渡都临安（今杭州），徽州成为京畿腹地，“中兴辅郡”。南宋后徽州经济、文化日趋繁荣。

在历史的长河里，每当外来文化的传入，都对歙县地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尤以晋东迁、宋南渡最为显著。西晋灭亡，北方仕族避难江南，带来中原文化。相传晋孔愉以永康之乱入歙②；晋元帝第四子司马晞被废时也流徙于新安③，晋时太守程元谭酷爱此间山水清幽而定居新安④，成了后来徽州程氏大族的始祖。程族在南北朝时又出了一位拒侯景、保鄱歙，战功显赫的忠壮公程灵洗，定居于歙之篁墩（今属屯溪），程氏宗族益为兴盛，称雄一方。宋代大儒程颐、程颢也自认是忠壮后裔，其先祖自歙辗转迁居伊洛⑤。由此可见，从晋时起，歙县已逐步形成“聚性而居，族祚永继”的局面。唐初，汪华据歙总管六州，封越国公。歙俨然为“江南大州”，汪姓也成了显族，连同方、吴、江、许、洪、鲍、凌、潘、曹、王等诸大族，“枝叶分布，所在为雄”。南唐时，李后主设砚务官于歙州，对龙尾石的采运和琢砚实行垄断，专供御用；同时，赐名歙州所产书画纸为“澄心堂纸”，连同李廷珪墨，遂奠定歙州文房四宝业的基石。迨宋，又创汪伯立笔。至此，歙州四宝俱全，名播遐迩。宋代，理学盛行，文风兴起。涌现出如罗颂、罗愿、祝穆、吴昶等乡贤名彦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程颐、程颢、朱熹。南宋理学家朱熹籍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其母为歙州处士祝确之女。朱熹的父亲朱松在其《先君行状》中述及其七世祖始从歙之篁墩迁居婺源⑦。“二程”祖籍也出自篁墩。“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南宋淳祐五年（1245）理宗赵昀赐建紫阳书院于歙⑧。历宋、元、明、清屡圯屡修，无

使间断。山长、监院皆一时之耆宿名流，明初唐仲实和清代桐城派大师刘大魁、姚鼐均先后主讲于紫阳书院⑨，继紫阳之后，逾兴办学之风。据县志记载，邑中书院其最著者达24所，社学112所，成了封建社会后期徽州文人学士的摇篮。从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到度宗咸淳十年（1274）147年中间，歙县人举士进士达86名⑩。其中擢高位的有理宗朝参知政事、右丞相程元风，成了徽州籍第一位“相爷”；景定间又出了状元程杨祖，至今仍有“丞相状元”石坊可稽；还有景定元年举进士的方回，是宋末元初著名的诗人。单从明洪武四年至清光绪三十年的533年之间，乡试中式（举人）计1552人；春闱中进士者达525人⑪。达官显宦，代不乏人。所谓“代代出丞相，朝朝有尚书”、“同胞翰林”，成了传称一时的美谈。当然，这只不过是科举盛事，而更多的学者，或因绝意仕途，或失意于科场，毕生潜心于学术研讨或技艺切磋，尤属英才辈出，熠熠生辉。歙人遗世各类专著，到清末收录统计已近两千种、数万余卷⑫。藏书家更是汗牛充栋，卷帙浩如烟海。后人称之“艺传千古盛，文章百代师”，誉之谓“文献之邦”。

人民创造了历史，推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山越古邑”、历“江东支郡”、“江南大州”、“中兴辅郡”而臻于“文献之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务院于1986年12月8日公布歙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党和政府遵循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悉心保护古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二、古城风貌和古建“三绝”

歙县处在万山丛中，县城依山枕江而筑，风景秀丽。城内保存大量的古代建筑。古城格局，历历堪征，曩日街巷，规模俱在。幸存的宋代遗构，有建于北宋的南谯楼（二十四根柱楼）和长庆寺塔（砖木结构实心方塔）；还有建于南宋的东谯楼（阳和门）和新州石塔。明清时代，徽商挟雄厚财势，致力经营，益增

伟构。加上近几个世纪以来，此间极少兵燹，昔时乡人又习惯守旧，修缮营建，一如旧制。这就把一座具有明清时代历史风貌的山城古邑基本上保存了下来，无怪乎一些海外游人惊呼：“在这里，我寻觅到了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下面，不妨观瞻一下“古城风貌”。

城池：府城和县城尚存有一千多米长的城墙。县、府两城如双环之相交。府城大抵为宋时重建的州城。“即山为城，因溪为隘”，颇有“山味”。原设有五道城门。如今，西门（潮水门）保存尚完整，有外、中、内三道门，外门早年倾圮，遗迹可辨。中门与内门之间为“月城”，古时借以伏兵。这种明代营建的“月城”，今属罕见，是研究城建史、军事史的珍贵实例。

公署：原府衙、县衙，已不复具原貌。但府衙中的“仪门”（知府升堂的地方），却尚完整，匾托、吊环赫然在目。县学宫明伦堂，现在尚存有甬道、丹墀和“成德”、“达材”二斋；孔庙还存有科名坊、泮池、石桥和局部庑廊。古紫阳书院外观规模未变，院内两壁前人所书《学规》刻石完好。最为可贵的还是前面提到的两座宋代谯楼。南谯楼，又名二十四根柱楼，楼在原府衙之前，筑台为楼，台虚其中，以为门阙。门阙两侧各斜立撑柱十三根，如同衙役手持“水火棍”拱卫府衙。门阙当中旧时置有中门，门柱不外露，故称二十四根柱楼。这种斜立撑柱，宋《营造法式》称之为“排栅柱”，如今国内已极少见到如此实例。楼上，古时置有铜壶滴漏，使人更番轮值，候更报时。东谯楼在原府衙左上方。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年。楼高三层，下为门阙。明改为鼓楼，又名阳和门。楼当街而立，宏伟壮观，是进入歙城大街的通口。此外，在南街还保存有城隍庙；在东门上路街保存有一座节烈祠。

街巷：歙城主要街巷，基本保持传统建筑风貌。早期的商业大街在大北街，晚清以后代之以新兴的中和街，即今日的解放街。街窄人稠，来往不绝，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呈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两面店铺林立，多为旧时门面。街面为一色青石砌

成，店铺门沿铺以卵石，使街容益加显得古色古香。歙城大街东南侧有条古巷——冲山巷，狭长深邃，幽静雅致。石砌台阶，步步登高，可攀登乌聊山之东阜，人称“洞天福地”。

水埠：离城约1公里处是古城水埠渔梁街。街在练江之滨，江中筑有一座“渔梁坝”。坝长138米，底座宽27米，高约4米，用青色坚石砌成。凡垒十石，立一石柱。层层条石皆凿作“隐锭榫”（俗称“无宝钉”）。上下穿锁，相互衔接，连成一座宛如人造的“石山”，以保坚固耐久，洪水不易冲决。据方志记载，唐、宋时代即在此处垒石为梁。现存的石坝是明代重建的。南岸有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修坝的记事碑。古人修筑此坝为截流蓄水，使上游水滞利于灌溉和行舟。同时，坝下滩险水急，挽缆维艰，筑坝也可缓急湍而利水运。昔日之渔梁，是城乡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商旅如云，舟楫如林，货积如山，人潮如海，如今虽人事变迁，景物依旧。渔梁街容也极为别致，其状如江边之鲫。街心路面砌以白色河卵石，宛似鱼鳞闪光，益肖其形。不少影视剧组远道而来，借以水埠街容，拍摄外景。

古桥：歙县古代多木桥。明代以后，“垒石求坚”，开始兴建大型石拱桥。歙城有三座大石桥，一曰“太平桥”，又名河西桥。南宋端平间（1234—1236）为浮桥，明初垒石，明弘治时（1488—1505）筑成规模类似今日的大石桥，尔后屡加修筑。桥有6孔，长近300米，宽7米有余，为安徽省境内仅见的巨型石桥，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心原有石亭，今已毁。碑记刻石移置太白楼内。1969年特大洪水冲毁桥栏、桥面石。1972年桥面改浇为混凝土，桥栏两边挑出延伸为人行道。幸桥身墙体和桥墩、分水墩无恙，依旧原物，弥足珍贵。二曰万年桥，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长150余米，宽6米，高10米，有9孔。现在，是从县城通往北乡必经的公路桥。三曰紫阳桥，明万历年造。9孔，长140米，宽14米，高14米。是歙县最宽、最高的石桥。桥在渔梁坝下，便于船舶不落风帆桅杆即可通行无阻。桥南有紫阳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当年游乐眷恋之所。朱熹也由此而号称“紫阳”。

夫子”⑭。山以人显，桥以山名。

古刹，其一为寺庙。昔时，城内西干山有10座寺庙，早年倾圮，在城区还保存有两处寺院，一是渔梁村口的白云禅院，又称观音阁。其右侧有明人孙湛手书“一带云根”摩崖石刻；江岸渡口传为唐时李白问津处⑮。二是出城7里的圣僧庵。始建于唐武德年间，寺后有灵泉（洗眼泉），明万历初“方外司马”汪道昆为之修葺，刻全部《金刚经》于佛座台基石壁之上。下堂四壁为明代著名画家黄柱手绘《渡海罗汉》、《侧坐观音》壁画和一幅未署名的红日祥云壁画⑯。其二为古塔。城内还保存有两座宋塔，一是长庆寺塔，始建于北宋宣和三年（1119），为砖石结构的实心方塔⑰；二是建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的新州石塔。明嘉靖间重修。这两座宋塔，塔基依然是800多年前的原物，现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歙县的古民居、石牌坊和大祠堂被建筑界誉之为“古建三绝”。

一是气势恢宏的石牌坊；歙县保存石牌坊之多，冠居全国。据文物普查时统计，全县尚存石牌坊达84座，其中建于明代的43座，建于清代的41座。砖木结构牌坊还不在于其内。至于城乡各地，宅第祠宇的门楼、五凤楼则不计其数。石坊型制不一，有楼脊式、“冲天柱”式；有方形四柱、八柱，也有“一字形”单门和三门的；有遍饰雕刻、工致华丽，也有平琢浑磨、不事雕饰的；其排列有作纵列七道、四道，也有三座横列一排。以跨街耸立的许国石坊最为典型，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距城10里有棠越牌坊群，7座石坊跨道纵向排列，一眼望去，显得宏伟壮观。电视《红楼梦》剧组在这里拍摄首场外景。歙县石牌坊的建筑造型、建筑工艺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受到人们的喜爱。

二是鳞次栉比的民居群：歙县村镇之中，屋宇毗连，高墙重叠，其街道深邃狭长，曲折通幽，往往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道路多用石板铺成，有的村庄在屋前开沟筑渠，引水绕村，复入田畴，兼收用水和灌溉之利，饮水则在屋内外凿井取用。民居外观

作封闭型，以梯形或弓形高墙（称封火墙）相隔。外墙除设大门和侧门之外，只开很小窗户。早期建筑的窗门采用大块方砖制成。既可隔热保温，又起防火作用。殷实之户则重楼宏丽，“楼上加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①7}。装饰更为华丽。墙头屏立，上置“印斗”，下托“金花板”，也有作“旗牌”形状。大门用青石门框，俗称“门牙石柱”。一般多以水磨砖砌筑门罩，或门楼，门侧两边凸出几层砖浅脚，上方饰以砖雕。房屋外观青瓦白墙，色调和谐；内部装饰典雅清幽，入目新颖。住宅分“四合屋”和“三间屋”两大类，其实“四合屋”也只是两座“三间”的相合。进深多为一、二进，也有深宅大屋作四、五进，最为典型的有蕃村鲍家大院和郑村西园、南园大屋。还有一种别墅小筑，设计颇具灵气，发人遐思。

三是豪华雄伟的大祠堂：明清间，歙县盛行敦本敬祖之风，大族均修祠扩宇，各房头竞先营建支祠，以逞豪斗富。一村之中，每每筑起四、五座大祠堂，据1986年调查，全县尚有较为完整的明建祠堂27处，清代所建祠堂，尚存之多，则数以千计。这些大祠堂，用料硕大厚实。有的竟采用整块长达6、7米，高1米多，宽70、80公分的大木料作月梁；用整根2、3米围、7、8米高的大木料作厅柱；开凿出整块10米多长、5米宽的大石板作台阶。豪门大族祠堂的“享堂”、“寝堂”，还采用一色的名贵木材如银杏等，称之“白果厅”；也有重梁叠架，号称“百梁厅”。上下堂及庑廊的栏板望柱，满饰雕刻。祠堂大门多作“五凤楼”高墙翘角，庄重华丽。歙县大祠堂建筑，无论是造型之生动，构思之奇巧，工艺之精致，装饰之华丽，都有机地把建筑实用和艺术表现加以揉合，堪称杰作佳构。歙县北岸的吴家祠堂，三阳的洪家祠堂，大阜的潘家祠堂，昌溪的员公祠、太湖祠都是大祠堂中的典型遗构。

三、灿烂的历史文化

徽州历史文化，璀灿夺目，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已经越来越

越引起世人广泛的兴趣。作为徽州府治的歙城，成为一座古文化的宝库，自属历史的际遇。

徽州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领域广阔，风格独具，自成体系，形成很有影响的学派和流派。皖派汉学，新安画派，歙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盆景，徽派建筑，徽派园林，新安四雕（竹、木、砖、石），以及新安文房四宝，在中国学术史、艺术史、建筑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新安医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深为世人瞻目。“文以人显，人以文传”，明清以来，在士林艺坛中声名卓著的歙籍名人，有汉学家黄生、程瑶田、汪中、凌廷堪、江有诰和现代的吴承仕等。程瑶田所著《通艺录》一书至今仍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现代经学大师吴承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由经学大师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汪道昆，潘之恒，方成培，以及与聂耳齐名的现代音乐家张曙等；有耆宿名儒朱升，唐仲实。元末朱元璋进兵徽州，朱、唐建言，颇受朱元璋称赞^{①9}。后人建有“龙兴独对”石坊，铭志其事，以为纪念；有著书、刻书大家吴勉学、张潮、鲍廷博等。清朝乾隆间，四库开馆，召求天下遗书。鲍廷博聚家藏精本600余种进呈著录；又刻家藏孤本，为《知不足斋丛书》，有画家郑重、李毓芳、浙江、王士慎、罗聘、虚谷、吴杏芬和现代画家黄宾虹、汪采白等。浙江是新安画派的奠基人，黄宾虹、汪采白传世之作，在海内外已成为收藏珍品；有书法、刻帖名家方两江（明季，邑中有传云：“室无两江字，不是大人家。”）、吴廷（刻《余清斋帖》）、吴帧（刻《清鉴堂帖》）、鲍漱芳（刻《安素轩帖》）^{②0}，以及为清人《艺舟双楫》^{②1}所推崇的曹文植、金榜、郑来等；有篆刻家程邃、巴慰祖、汪肇龙、胡唐等；有制墨家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曹素功、汪节庵^{②2}等；有古籍版画名手荟萃的虬村黄家刻工。据《黄氏族谱》记载，黄氏刻工流寓杭州、南京一带即达100余人，其著世者有：黄倭、黄应泰、黄应瑞、黄尚文等。黄鳞曾刻明万历《北西厢记》、《程氏墨苑》。黄建中曾刻明崇祯版《新刻绣像金瓶梅》、清顺治本《博古叶子》、黄

德时曾刻明万历《方氏墨谱》等，均为后人奉为艺林珍宝；有杏林高手程敬通、郑康宸以及郑宏绩世传西园喉科、郑海涧南园喉科^{②③}等；有著名的数学家汪来，所著《衡斋算学》^{②④}，颇有影响；有物理学家郑复光，所著《镜镜论痴》一书，至今犹为科技界所推崇。还有清末著名理财家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注释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在现代名人中间，最有影响的当推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前人的成就和业绩为后人树立楷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歙县新一代名流如同群星灿烂，其成就必将大大超越古人。

徽州文化艺术的繁荣，同徽商崛起提供巨大的经济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徽州富商大贾，不惜重金竞相收藏历代名家名画以及金石、名瓷、古玩，竞相“扩祠亭、立牌坊、兴宅第、构名园”。这就极大地刺激着这里的绘画、书法、篆刻以及百工技艺的姹紫嫣红。徽歙一带民俗文化宝藏也极为宏富。诸如风土人情，百工伎乐，婚丧庆典，祀礼祠规，恤贫济老，节日圣诞，村志谱牒，方言土语，烹调面点，酿酒制茶，曲牌鼓板，目莲徽剧以及山珍土产，各具神奇传说，各具地方风味，异彩纷呈，引人入胜。

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解放以来，歙县的文化事业空前的繁荣兴盛。新安画风发扬光大，更具广泛的群众基础，歙县成立了新安画派研究会、书法协会，建立了黄宾虹纪念馆。城乡各地年复一年举办书画作品展。不少歙籍画师的佳作，还相继在日本、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展出。歙县遗存大量古代碑碣法帖，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早自50年代，国家文化部门就已重视对这批刻石的搜集整理，以后又不断征集、保护，终于在歙县太白楼后坡建成“新安碑园”。集中收藏各类书法碑石250余方，其最著者为明万历间上石的《余清斋帖》，汇刻晋、隋、唐、宋名家名迹，计8册4卷共61方碑板。此帖早已蜚声中外，尤受日本书道界较高评价。被誉为“……多从真迹上石，实为灿然”^{②⑤}。还有11方元代元统二年（1334）石刻浮雕。由此可稽，早在650多年之前，歙县古代匠师就已经把“四雕”中的石雕，集之大

成，蔚为大观。新安碑园平均每年接待观众6、7万人次，对于歙县书法艺术和雕刻工艺的发展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歙县城乡文化部门还重视民间“采风”，搜集整理了一批珍贵史料和传统的戏剧剧目、鼓乐曲牌、民谚民谣，乡土气息非常浓郁，受到安徽省文化厅和国家文化部的关注。

四、古城的新兴之路

文物要保护，名城要发展。城市人口在不断增长，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解放初期徽城11条街（村）总人口仅约1万1千人。如今，全城长期居住人口达3万余人。在居住条件上，人们都竭力追求有一个舒适、宽畅、充裕的生活环境，各类危及古城风貌的新建筑物不断涌现。名城究竟如何保护，如何发展，古城新兴之路何在？！在长期实践中，歙县探索出一条初具成效的途径，这就是：

1、全面规划，以法治城。在名城的保护和发展方面，坚持规划管理，坚持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城市建设的法令法规。对有关城建问题，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坚持科学和民主两个前提。近几年来，通过实地勘察和科学论证，制订出了《歙县城镇建设总体规划》、《歙县古城保护规划》、《新区开发规划》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商业街的保护方案》等一系列法规，对名城的保护和发展，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止“建设性的破坏”，防微杜渐，因势利导，从而扭转了城建中乱建、乱拆、乱改的现象，初步做到使名城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切实得到保护。

2、开发新区，保护名城。为了减轻老城区所承受的沉重压力，县政府划出练江西郊一片面积约2.7平方公里的丘陵地辟作新城区，架设练江大桥，将新城区和老城区连成一线。近年来，新城区开发已初具规模，几十幢高楼拔地而起，数百间民宅遍布四周。这样，就有可能腾出老城区，使之真正成为一座文化旅游城，成为一座露天的大型历史博物馆。

3、依靠多方面力量，抢救文化遗产。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歙县文物古建筑的保护。早在50年代，国家文化部门就派出专家前来歙县和徽州其他各县调查考察。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跋山涉水几乎走遍歙县古建筑比较集中的乡镇和村庄，写成具有重大影响的调查报告。在他的倡议下，国家建设研究部门还组织力量实地勘察，出版了《徽州明代住宅》一书（在所调查的26幢明代住宅中歙县占22幢），在海内外建筑界受到高度评价。通过调查研究，歙县明清建筑日益为人瞩目。国家文物部门先后拨款100余万元补助歙县对古建筑的修缮保护，还选择其中最为典型而又不适宜就地保护的5幢明建住宅、2幢明建祠堂和1幢明建路亭拆迁重建于潜口紫霞峰麓。形成一处明代建筑群，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成后因区划变动移交徽州区管辖）。解放以来，曾多次派出专家深入歙县民间征集和鉴定文物抢救出数以千、万件的书画、版本、名瓷、古砚以及其他极为珍贵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隋唐时写经，唐人家书手迹和罕见的古代名家书画精品，不仅向上级文物收藏单位提供了大批珍品，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歙县博物馆，悉心保护地方文献文物。歙县博物馆藏品较精，经国家鉴定委员会定为精品的明清书画名件即达9件（16幅）。国家文化部门曾从全国各地出土文物中精选近200件珍宝在北京举办展览，其中歙县选展精品就有6件。50年代后期，郭沫若同志视察歙县时，曾对圣僧庵明代壁画和碑石进行考察，提出了极为重要的保护意见。此后，此处名迹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激励了干部群众重视文物保护工作。

4、振兴传统行业，发扬地方优势。歙县是徽商的老家，传统行业主要有：制茶业、文房四宝业、建筑业、印刷业和雕刻工艺业。歙县是全国产茶最多的县，解放以来，制茶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名茶产品，享誉海内外。顶谷大方，黄山毛峰一直被列为国家使馆的礼品茶，保持了很高声誉。徽墨、歙砚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名牌产品年年创新，连获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金、银质奖。同时，发掘古代制毛笔、造纸工艺，发展了书画纸和毛笔制

造工业，在建筑业方面，继承和弘扬徽派古建筑优势，培养起一支古典园林建筑设计、施工队伍。在省内外承建多项工程。徽州古建筑研究所还为德国法兰克福市建起一座徽派园林——春华园。工程竣工验收时，受到德方高度赞扬。此外，还发扬印刷业、雕刻工艺业以及食品加工，干鲜果加工等方面的传统经济优势，促进这批工业企业的稳步发展。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歙县还适时发展一批新兴企业，如丝绸、仪表和化工等。这些新兴企业吸取古代精华，改进经营管理，更加显示出地方经济的优势和作用。

歙县背靠黄山，是登山的要道；也是登山旅游补给的中心。名山古城，交辉相映。必将对皖南大旅游区的开发发挥出越来越加显著的作用。

（本文作者是歙县政协副主席）

注释：

①清·朱彝尊《曝书集·送曹郡丞之官徽州》

②、③、⑦、⑨、⑩、⑬、⑮、⑯、⑱、⑳、㉑、㉒、㉓、㉔、

㉕、民国《歙县志》

④、⑥、⑪清道光《徽州府志》

⑤、⑧、⑭《紫阳书院志》

⑫据《守史》

⑲吴晗《朱元璋传》

㉖清·包世臣《艺舟双楫》

⑬、⑳中村不折《法帖书论集》

太平龙门三百天

朱 农

1947年9月，中共皖南地委在泾县涌溪召开会议。根据斗争的需要，决定撤销铜青贵县委，将泾太石县委领导的泾县厚岸和太平龙门区划归泾青南县委，龙门作为县委后方；我担任县委书记，陈尚和同志任副书记，王安葆、张华、陈作霖、尹彬同志为委员，孙太英任县委组织科长。还成立了泾青南县人民政府、县游击大队，我兼任县长和县大队政委。届时，上至太平龙门，下至芜湖，南到青弋江，北到长江边，建立了以宾山地区为中心的泾青南游击根据地。

一、落叶时辰进龙门

龙门处于太平、泾县、青阳三县交界点，素有72坑之称。这里山多树多，林木茂盛，地理环境复杂，便于隐蔽和转移。龙门盛产木材、茶叶，久负盛名的皖南名茶猴魁，就是产于猴坑。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铜陵就有幸喝过这种茶，那时，茶商经常去铜陵卖茶叶，我们品尝后，觉得这种茶确实不错，为了统战工作需要，就买一些送给民主人士，以联络感情。

1947年夏秋，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部署重兵加强沿江防线，先后调来整编六十三师、四十六师一个旅和一个宪兵团及首都卫戍团，分别进驻芜湖和皖南其它地区，配合省保安总队、各县地方武装，向皖南游击根据地特别是泾青南地区，进行大规模“清剿”。10月10日，国民党在芜湖正式设立了“清剿”指挥所，由安徽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龙炎武任指

挥，在国民党太平县龙门乡乡长胡伯衡的配合下，对龙门地区进行大肆“清剿”。他们强迫共产党员自首和民兵登记；大搞移民并村，把田季坑、小河坑、竹园坦、下坑、上陇坑、王家山一带的群众强行移到草滩以外的地方。民兵组织遭到了破坏，有的党的组织也受到损失。

我们于11月初去龙门。到后，立即成立了中共龙门区委、区人民政府。孙刚任区委代书记，巫乐天任委员兼区长，鲁凡任组织委员；龙门乡长先为周进臣后为方也人，新丰乡长是泮拔夫，永丰乡长是杜阳生；周木荣任区警卫队队长，周代焕任副队长、周明旺任指导员。龙门地区原属泾太石县委领导，工作基础较好，因此，恢复工作比较顺利。

中共泾青南县委针对当时情况，就龙门地区工作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要稳定群众情绪。第二，要多做团结工作，争取地方士绅、保长，发展统一战线。明确宣布对过去曾反对过我们，现在改变反动立场的人，仍作为朋友看待。第三，要求被迫自首人员继续为我们工作；即使做了坏事的，现在不再为敌人服务，则既往不咎。第四，对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要严加惩办。

龙门区委根据县委的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联系走访党员、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千方百计地提高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增强必胜的信心。我们又通过地方党员和干部，分头去各村庄，弄清地方士绅、国民党保甲长动态，并联系他们，分别做工作，广交朋友，孤立敌人。由于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一地区的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同时，派出警卫队，由鲁凡同志带领前往新丰、杜村等地活动。新丰、永丰乡干部，积极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各界人士，配合部队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敌斗争。

二、寒风雪夜敌追剿

1948年1月，国民党六十三师和青阳县常备大队共200余人，向驻在青阳县金家冲的中共泾青南县委机关疯狂进攻。我县大队

在民兵的配合下，埋伏在金家冲冲口两边的山头上。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我方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共毙伤敌兵十儿人，缴获长、短枪各一支。敌人偷鸡不成折把米，损兵折将，匆忙撤退。

金家冲战斗之后，我们决定转移到龙门。不巧，正赶上大雪天。在一个异常寒冷的风雪夜，我们从青阳出发，经十里山，渡过龙门河，到达龙门街附近的一个山坑才停脚歇息。第二天，大雪仍下个不停，我们由龙门岭转移到草滩后边的一个山坑。这天晚上，我们正好遭遇由太平经草滩开往龙门的国民党保安团。交火后，我们感到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继续打下去对我方不利，便主动撤走。事后，我们发现一个炊事员掉队被敌人抓去杀害了。

这时，已到古历腊月二十三，大地象罩上一层厚厚的白沙帐，积雪覆盖了整个大山和路面，部队过后留下一串脚印，国民党保安队寻迹紧追不舍。在这种严重时刻，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和必要的休息，必须改变原定的行军路线，迅速甩掉身后的尾巴。在走到下坑冲口的一座小桥时，我命令部队原地待命，并赶忙派人借来一个小木梯，让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顺着梯子下到桥下的水沟里。战士们头顶雪花，脚踩沟底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石块，伴着潺潺流水和西北风的怒吼声，拖着麻木的双腿，艰难地走下了一里多路，然后顺着小道到达下坑休息。

为了麻痹敌人，掩护大部队休息，我同时派了五、六名战士沿路继续前进，让敌人继续顺着脚印跟踪追击。待敌人觉察上当受骗，为时已晚，这几个人已在十几里路以外的一个山头上休息，并派了瞭望哨，观察敌情，以防敌人突然袭击。望见敌人来了，又立即转移。这样，我们部队少数人辛苦，多数人安全休息，敌人只落得个疲惫不堪，一无所获。

由于国民党六十三师的严重“清剿”，我们不能收税，经费发生困难，随由过去收税，改为在泾、青、南、铜、繁、太地区

以皖南人民解放军长江总队负责人朱农名义发行“救国公债券”，票面为500万元、1000万元、1500万元和3000万元四种。认购对象，主要是资财较多的地主和工商业者。采取自愿认购的办法，来解决部队的供给。

三、龙门山区过春节

这一年春节我们是在龙门过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敌人继续对我们进行“清剿”；另一方面，我们想利用春节的机会，买些鸡、鱼、肉、蛋、酒，把地方的一些士绅、国民党保长和群众代表请来，一起欢度新春佳节。借此机会，我向大家讲了国内的大好形势，鼓舞了人心。皖南游击根据地虽然遭受反动派的“清剿”，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依靠三大法宝和广大群众，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我们要认清大好形势，继续艰苦奋斗。我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进一步增进了友谊。

春节过后，部队开往龙门乡黄金坞、小河口、黄金滩一带活动。小河口处于泾太交界处，曾经是新四军医院、军械修理所等单位所在地。这个地方离龙门不远，经常有特务出没活动。我们到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联系地方士绅，多方开展工作。

随后，为加强与泾青南地区的联系，我们又转移到水东瞿（现在的陈村水库）与龙门之间的米季坑。这里离龙门约十里路与泾县水东乡公所仅一山之隔，经常有人到此采购木材、木炭或做其它生意。以前，我们很少在米季坑活动，敌人不大注意。为了安全和保守秘密，我们在山上搭起一些山棚。白天，部队住在山棚里，只派少数干部下山了解情况，做群众工作。

春季到来，柯斌同志于1948年4月带领部队前往青阳活动。这时获悉：泾县厚岸乡公所为了扩大反动武装，在芜湖购买一批武器，要从青阳杨田埂转运，由厚岸乡公所自卫队负责于4月某日押运，经青阳的杨田乡白马塘回厚岸。柯斌、方忠元率领部队十余人，提前埋伏在离白马塘不远的土地庙附近，隐蔽在油菜地里。待押运武器的敌人进入伏击圈，柯斌一声令下，我游击战士

一拥而上，并高喊缴枪不杀，敌兵见势不妙，急忙弃枪投降。这次战斗，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其中机枪两挺，步枪和短枪十多支；俘获了全部敌人，并击毙两人。这一胜利，鼓舞了我游击部队的斗志，震动了太平、青阳、泾县一带的敌人。

四、采茶要与敌人斗

我们对敌斗争的手段，有军事的、政治的、还有经济的。龙门是乡自卫队的据点，驻有国民党保安团。采春茶季节即将到来，被移到草滩等地的农民急着回去采茶而回不去，群众议论纷纷。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两个办法：一是要国民党太平县龙门区党部书记王国荣去找胡伯衡（王、胡之间私人关系很好），讲清利害关系，指出龙门地区盛产茶叶，特别是出产皖南名茶“猴魁”，耽搁了采茶季节，农民的生活就没有保障，要胡三思而后行。二是发动地方党员群众联名写报告，要保长、士绅去乡公所交涉，说群众要活下来，就要采春茶，就要把家搬回去，不然日后农民生活无着落，就找保长，保长怎么办？迫使敌人不得不允诺群众回去摘茶。

我们利用合法手段，赢得了这场对敌斗争的胜利，大批群众从移居的大村庄搬回原来的住处，安心采摘茶叶，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有人为祝贺这一合法斗争的胜利，编了一个顺口溜：

反动派，真坏蛋，
并村庄，搞移民；
为活命，要采茶，
群众起，与敌斗；
敌无法，只允许，
村村喜，人人欢。

我们的部队住在龙门大山上搭盖的山棚里。这时正值春暖花开时节，山棚周围兰草花清香四溢，茶叶也长出嫩芽，我们及时采下，放在大裱纸上，下边用木炭火烤干，用开水一泡，很快喝上了新茶。有的同志说：“游击战争最艰苦，龙门名茶我先尝”